

红色记忆

汉长安城遗址里的红色印记

——中共地下党人第五伯昌的岁月往事

□ 岳兰兰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赴同学邀约到母校天禄阁小学故地重游。为了“申遗”保护汉长安城遗址，位于未央宫遗址的九村寨和天禄阁小学都拆迁了。母校旧址上的天禄阁遗址却完全裸露出来，显得格外高大雄伟，当年阁台前的那座教研室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国时期保护机构旧址”，另一块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天禄阁小学旧址”。

进门后我们发现，房屋四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文字等资料，记载着母校建校以来发生过的历史大事件。通过讲解，我们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禄阁小学曾是中共地下党情报站，其中一个叫“第五伯昌”的名字吸引了我，他是校友第五巧莲的祖父。

随后，我见到了第五巧莲。交谈中，我才知道她对自己爷爷的情况知之甚少。她说，2011年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开馆仪式时曾邀请她，她因事没能参加，但她心里有个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回趟老家，弄清楚爷爷的革命史和家族的情况。去趟旬邑，我俩一拍即合。

我们开车一路向北，在旬邑县魏洛村找到了第五巧莲堂叔第五岁勤和堂弟第五书峰的家。通过第五巧莲堂叔、堂弟的口述以及马栏革命纪念馆的图片和事迹介绍，我们对第五伯昌的革命历史有了了解。

第五伯昌，字良栋，化名正德，1889年生于陕西省旬邑县魏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1年，旬邑大旱，民不聊生。为维持生计，他的父亲出外做苦工，因病客死他乡，留下母亲和年仅12岁的第五伯昌等三个幼子艰难度日。由于家庭贫苦，他少年时只读了两年私塾。当时渭北兵荒马乱，饥民遍地，平时喜欢武术拳脚的他，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练出勇敢正视困境、积极克服困难的、坚强自立的人格。民国初年，第五伯昌受三民主义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毕墨轩部队，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被提拔为班长。但因不满

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毅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1926年秋，中共旬邑特支(地下党)书记许才升以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筹委身份作掩护，在旬邑县城成立农民协会，之后又在旬邑县西区(张洪)建立农民协会。第五伯昌立即报了名，还说服亲朋邻里参加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该区农协主席，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建设，建立旬邑县张洪区农民自卫军，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利益，使张洪区迅速形成“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局面，为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7年3月，第五伯昌请求旬邑特支书记许才升在魏洛村创办平民夜校。在他的宣传动员下，有40多名贫农参加了魏洛村平民夜校，一边读书识字，一边接受国民革命形势教育、了解中共政治主张、明确农民运动的意义。在此期间，第五伯昌同11名进步青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旬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魏洛支部，第五伯昌任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中共旬邑特支改组为中共旬邑区委，1928年5月领导发动了以清源区农民武装为主体的交农起义。起义当晚，第五伯昌作为骨干分子，参加了攻占国民政府旬邑当局县城及政权机构的战斗。随后，他奉命与程群驹马赴彬县泾河畔侦察国民党军动向，此日又与程百印、程永延一道率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30人，赴彬县黄家桥一带设伏警戒。同时，中共旬邑区委又采纳了他的建议，再派出300人力，加强设伏警戒力量，防止国民党军突袭，巩固起义成果。

5月30日，因变节分子刘兴汉里应外合，彬县国民党军及旬邑县民团绕道抓捕了中共旬邑区委主要领导许才升等7人。第五伯昌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的游击队进行阻击，展开积极营救工作，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多处负伤的第五伯昌掩护

30多名队员成功撤离，奔赴北山，营救行动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第五伯昌并未悲观失望。1929年初，他又主动寻找中共三原县委，对接组织关系。第五伯昌随即奉命赴淳化县白庙、薛家一带建立农村支部。他发展任连俊、李三合等人为中共党员，建立起中共淳化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白庙等地支部。后来，第五伯昌受党组织指示回到旬邑，秘密恢复了中共旬邑特支，地址就设在东关崔廷儒家，自己任社会委员，负责联络和统战工作，为恢复党在旬邑地区的组织、开展活动打好了基础。

1929年，关中地区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颗粒无收，饿死的饥民随处可见。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陈云樵等赴三原县武字区等地组建灾民自救军，抗粮抗徭、惩办土豪劣绅。陈云樵为司令，黄子文为政委，政治部有习仲勋、第五伯昌等。筹建苏维埃政府，黄子文任主席，第五伯昌任副主席，灾民自救军改名为渭北游击队。后来，这场斗争在反动武装的进攻和叛徒刘遂凡的告密下，黄子文等同志遇难，第五伯昌所率领的旬邑同志也被打散。

1930年至1932年，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对当时党的组织进行整顿，清理党内动摇分子，继续发展农村支部。第五伯昌负责郝村等4个支部，又成立了芝村等7个农村党支部，动员了数十名有志青年加入陕甘游击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1932年4月，第五伯昌侦察到，国民党旬邑县城警戒疏忽、兵力空虚，防守不严，并及时将这一情报传递给陕甘游击队、游击队一举攻克旬邑县城。

1932年10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改编，以壮大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旬邑特派第五伯昌代表党组织前往祝贺并给游击队授旗。当晚，他为陕甘游击队做向导，协助谢子长攻入职田镇，捣毁国民党职田区公所，成功擒获国民党职田民团团长唐碧武等人。

1933年，第五伯昌奉上级组织指示改名为第五正德，前往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柯家寨，以租地务农身份潜伏下来，并开了个面坊，以为西安城内送面作掩护，往返于城乡之间。第五伯昌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编入未央宫天禄阁小学情报站，会同吉午中、饶紫云夫妇、魏炳林、石凯夫几位教员身份的地下党员一起收集传送任务。

位于西安市北新街的七贤庄，有一处中共“秘密交通站”。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这个地方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红军西安联络处”更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那些年里，第五伯昌一直是这里的“送面”常客。他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频繁往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第五伯昌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大门，发现有可疑人盯梢，于是放弃向西直走，快速穿过十字街反向而去，成功甩掉“尾巴”后完成了情报传送任务。

1943年12月，薛樵(石恺夫)因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而处境危险，情报组请示中共中央社会部后，立即让薛樵速回延安躲避。第五伯昌自荐护送薛樵回延安，一路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多道封锁线，最终成功护送薛樵回到延安。直到1944年夏季，中共中央社会部才通过地下交通站将他送回西安。老战友习仲勋送他一匹大白马，进入西安后的第五伯昌乔装成国民党军官，骑着白马回到柯家寨，继续做情报工作。

因长期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工作，第五伯昌因劳累成疾，不幸于1947年2月病逝。

马栏革命纪念馆里，第五伯昌遗像下有一段这样的话：“第五伯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惧艰险、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一生，是一名朴素、纯粹、坦荡、优秀的中共党员，是一名值得旬邑人民纪念和怀念的人民勤务员。”

文史小百科

唐诗中的边塞古城

边塞诗是唐诗中的瑰宝，描写了雄浑壮美的边塞风光、奇异的风土人情、战争的残酷、征戍的艰辛，表达了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以及对和平岁月的向往，彰显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有人统计《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诗中所提到的城市有的已经改名，有的甚至废弃或湮灭，但这些诗却早已和城市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岑参《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诗云：“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该诗提到了五座城池：临洮指临洮军，驻狄道，今甘肃临洮。地处古丝绸之路要道、唐蕃古道要冲，自古为西北名邑、陇右重镇。唐朝初期，置临州，后置狄道郡；北庭即北庭都护府，府治北庭城(金满城)，它既是军事指挥机关，又是行政管理机构，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交通枢纽。维吾尔语中的“金满城”就是吉木萨尔，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城以北10多公里的北庭乡；轮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西汉政府在此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摄天山南北，唐曾设龟兹都督府。轮台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重要支撑点，是西域36城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疏勒，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境内。唐太宗时，疏勒国三次遣使入唐，强烈要求在西域设置唐朝的派驻机构，以统辖各国。唐太宗发兵西域攻占高昌，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并夺回龟兹、疏勒、于阗等地，天山以南失地尽为唐朝收复。唐太宗将安西都护府从高昌迁往龟兹，恢复两汉以来的旧制；同时宣布正式建立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镇即军镇，是唐朝派驻西域的军事机构。唐上元二年又成立疏勒都督府；武威今属甘肃省武威市。西汉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郡置县，为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在原休屠王领地置武威郡，武威由此得名。唐太宗贞观元年，武威郡属凉州。

唐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海战败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出塞宣慰，写下了《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居延城，是中国汉唐以来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17公里处。西汉强弩将军路博德修筑居延塞。后沿弱水岸筑长城接酒泉塞，遂成为历代屯兵设防重镇。居延今已没入沙漠，附近曾发掘出著名汉简。李颀《古从军行》诗云：“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交河，古县名，故城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西面，位于两条古河床交叉环抱的孤岛地带，故名交河。交河故城是公元前二世纪至五世纪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的，在南北朝和唐朝达到鼎盛，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交河故城。九至十四世纪由于战略位置重要，连年战火，交河城毁损严重，终于被弃。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都市遗迹。

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人王昌龄，27岁赴河陇、出玉门，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深的边塞生活体验，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其《从军行七首·其四》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玉门关是汉长城的关隘之一，始建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也是汉之后多个王朝的边关，许多描写边关的诗都会提到玉门关；楼兰，位于罗布泊西部，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古丝绸之路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楼兰在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公元630年突然神秘消失，共持续800多年的历史。现今只留下了一片废墟遗迹。尽管在唐朝建立之初，楼兰已不复存在，但唐诗中却屡屡提到楼兰，这与唐代文人推崇汉朝戍边将士是分不开的。为唐诗注入了奋发向上的浩然之气，抒发了诗人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版。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史海钩沉

千阳知县罗曰璧

□ 李慧奇

养过蚕、缫过丝。

《景东县志》畜牧养殖业总论里记载：“其它养殖业有养蜂和养蚕，不多。”分类叙述中再没有提到这两类。那么，他在家乡参与养蚕的可能性不大。然《平利县志》载，“道光六年(1826年)任知县的司徒修，下村即劝民兴水利、广积储。梓《蚕桑须知》《树桑百益》等书教之民”。陕南平利县，明洪武年间就有农桑记载，说明当地植桑养蚕的技术很成熟。道光十年罗曰璧任平利知县，虽上任不到一年，但他乐参与、好学习、善总结、再推广，离任赴千时，不排除将《蚕桑须知》《树桑百益》的内容带到了千阳。

史料虽没有留下多少农户从事养蚕的记载，但罗曰璧任知县十年后，千阳县志“物产·货类”中将“丝”放在了第一位，足见当时蚕桑业的繁盛。

上世纪九十年代，千阳桑园面积达到6万多亩，川源镇村几乎家家有桑园，户户养蚕。

三

3300多年前，商代已有较为成熟的公办学校，后孔子又开创了私学先河。公元前506年，燕偃二次从曲阜返千后创办了渔阳塾坛。这足以说明偏于一隅的千阳，重文兴教起步极早。

那天，当罗曰璧来到三贤祠前，未曾开口，心却被抢眼的一幕狠狠地扎了一下。明末附设于此处的翰庵书院，本就狭小简陋，此时更是残破不堪，徒具虚名。夜晚，在油灯的映照下，满脸愁容的他只想着一个字：钱。

作为知县，他清楚地知道，全县田赋、税收、附加等各项年征银五千余两，上解近一半，留下的还要支付29项之多，所剩无几。即便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连修修补补的多余银两都没有，更别奢望新建书院了。但他始终坚信“学校关乎风化，乃为政之大端”，在千难万难中，兴文教的决心始终未变。

1837年(道光十七年)，新书院破土动工，这已经是他任千阳知县七年后的事了，可见久拖不决的原因还是缺银。等了几年也没有多余的银两，于是他只有捐出自己的养廉银。清知县的俸薪很低，千阳知县的俸薪银23.7两，但养廉银有600两。

他在《创修千阳县考碑记》中说：“千小邑也，纳税不过五千，而童试则四百

余，历试数次，搭盖席棚以为考场。匪特风雨堪虞，亦且关防难密，殊属不成事体。”以席搭考棚，他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书院历两年竣工，取名启文。书院整体呈长方形，格局新颖，设施齐备。大门三个，中间称之龙门，左右两开。龙门至后堂，中间一条甬道，以条石、青砖铺之。以甬道为中线轴，对称结构建筑，分前后两院，建有客厅、讲堂、考棚(童试教室)、书房(图书馆)、碑房(档案馆)、宿舍、厨房、门房等五十多间。书院建成后，罗曰璧邀请时任凤翔知府的豫泰撰写碑文，“泰骤闻而讶”。

为书院长远考虑，罗曰璧每年将狼牙洼、赵家河、普门寺等处地亩收的租钱用于书院开支，铺面出租钱用于后期维修。又将学田的亩数、界址存立县案，永为查据。

如此有力的举措，让启文书院尽显一派繁荣。所收生徒分编两班，每班有时达六七十人。清代后期，千阳人才茂兴，归功启文书院。

四

千阳大地，人类居住史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自汉置榆麋县始，历经晋、隋、唐、宋、元、明等朝代更迭，至清朝前，已有一千多年的建县史。然而，直到1650年(清顺治七年)，来千任知县的江都进士王国玮却发出了“凡郡邑都有志，千独无志”的疑问。这一声疑问，直到今天仍在一些文史者的口中常常听到，但没人能给出足够信服的答案。

1731年(雍正九年)，任千阳知县的江南武进监生管旌下车即索志，“始知千之志于明季兵燹之后已散佚而不可考”。这是旧志史料上的记载，也是唯一对王国玮之问的回答。

县志，是一个县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千年时间空间的浓缩，反映着这个地域的前世今生，是一个县的“家谱”。王国玮任知县后，公务之余，访遗址、询故老、采旧闻，三年后终成《石门遗事》一书。81年后，新任知县管旌到千后索志，“遂以《石门遗事》暨《增补轶事》送阅”。他看过《石门遗事》后说：“土俗民情较为详尽，官师人物较为简略，缺漏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称不上志。”

而管旌看到的《增补轶事》，却是1711年(康熙五十年)江南宜兴岁贡吴宸偕任千

阳知县时，对《石门遗事》的建置、官师、人物、选举等增补史料，又新增流寓、艺文二目而成。

罗曰璧到任后，认为《石门遗事》及《增补轶事》不全不详，加之断修已近百年，遂重修志书。他取旧志与州府志详加参考，优者沿用，劣者淘汰，对旧志未记的内容，考遗迹、访名士，分纲列目记载。全志设地理、建置、典祀、田赋、学校、官师、人物、选举、烈女、艺文、纪事、译异12卷96目，卷首附图14幅，约10万字。断限上至夏，下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志成题名《重修千阳县志》，它也是千阳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称作“志”的县志。

五

罗曰璧是一位典型的清代文人官吏，干的很多工作也都用文字记了下来，正是这一点，也为今天的千阳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如《书院》一文，记有新建启文书院的建筑物，经费来源渠道和数量，开支的名目和数额。增修、重修的县署、庙、祠、楼、坛等，也都用文字或碑记的方式进行了记述。

“下车伊始，集首事商议重修年久木朽渗漏的启圣祠，自捐廉俸四百金。”在他任内，面对捉襟见肘的收支，他没有压榨搜刮百姓，十余年内任前后八次捐银捐粮，创建书院、重修祠庙、裱糊县署、新建义仓(赈灾)。

罗曰璧在任时，幕僚们因他勤政尊敬有加，离任后，百姓们因感恩敬他为神，建“忠爱祠”纪念他。在百姓心中，这位时常操着一口浓重乡音的知县，这位来自遥远西南边陲的外乡人，所做的爱民之事深深地镌刻在了千山之巅、千水之河和百姓心之尖。

建祠是百姓对办了好事的人最纯粹的一种虔诚膜拜。“有生佛万家之誉”，这是故乡旧景东县志对他的褒赞。(生佛万家，是指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出自宋·戴翼《贺陈待制启》：福星一路之歌谣，生佛万家之香火。)

自从司马迁写成《史记》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在做每一件大事时都会想到悬在头上的那支巨大史笔来。一支支细史笔也照样悬在各级官吏的头顶，在千阳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罗曰璧赢得了身前身后名。